

南懷瑾文化

孟子
滕文公
告子

南懷瑾 講述

孟子與告子

上篇

《孟子》一共有七篇。如果依照道家《莊子》《淮南子》《抱朴子》的分類方法，《孟子》的前五篇可以說是「外學」，自《告子》這裡開始，則可以說是《孟子》的「內學」。「內學」這一名辭，亦見於佛家五明的「內明」之學，也就是「內聖」之學。而儒家後世所主張的「內聖外王」這一名辭，本出自《莊子》，儒家襲用了。

「內聖之學」、「內明」，就是一般所說內在修養的境界，如何能明心見性；「外學」則是外用之學。所謂「內聖外王」，依古代中國文化的解釋：「王者用也」，並不是說內在要作聖人，外面要當皇帝；而是處世、作人、做事，如何應用。

內聖之學，在中國文化中，有一兩千年的爭論，甚至直到現在，與佛家、道家，以及西方哲學發生的爭論，都是哲學思想上非常重大的問題。

《孟子》這裡一開始，就談心性之學。我們先看他的原文。

告子的人性論

告子曰：「性，猶杞柳也；義，猶桮棬也；以人性為仁義，猶以杞柳為桮棬。」

孟子曰：「子能順杞柳之性，而以為桮棬乎？將戕賊杞柳，而後以為桮棬也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，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，必子之言夫！」

告子是與孟子同時代的人，在諸子百家中，他本身的著作並不多，僅在其他的子書中，見到一點點有關他的思想言論。他之所以聲名宏大於後世，是因為孟子批駁他的學說所造成的。告子講的人性學說，究竟是什麼呢？

告子的理論，說人性像杞柳樹一樣，一棵樹長大成材了，將來或做成茶杯，或三夾板，或其他器具，預先並沒有決定。也就是說，人性本來就沒有定型，後來因為人為的教育關係而有善惡是非、道德仁義之別，就如同用杞柳木已製成了餐具「柶棬」那樣。現代因為石油化學工業的發達，塑膠餐具美觀而價廉，所以陶瓷、玻璃杯、盤、碗、盞等餐具，已漸被捨棄，成為有錢人家的擺設，木製餐具更為少見。但是幾十年前的鄉下，還可見到木製的酒杯、餐盤。

我們用的碗，本來都是寫作「案」或「碗」，這裡的「柶棬」也都是木旁，從字的構造上就表明了，古代的餐具多為木製，面盆、澡盆等等，許多器皿，都是木製的。當石油化學原料以及玻璃器皿初上市時，多是西方國家的工業成品進口來的，外國來的東西價格高昂，而被視為奢侈品，很稀奇。經過幾十年來的演變，木製的手工藝品，反而身價更高了，外國人甚至買回去作「擺設」，陳列在客廳中當古董、藝術品賞玩，觀念上相差很遠。

告子這裡說：一株杞柳，不能說是方的，也不能說是圓的，經過人工砍

下來以後，再把它雕鑿，才成為一個或方或圓的杯子。人性也一樣，本來沒有善惡的，經過父母、家庭、學校、社會的教育培養，人就有思想分辨的能力，知道哪個是「善的」，哪個是「惡的」，就有了是非的觀念。人之有道德仁義，也就好比是杞柳樹，經過人工的雕刻而後成了杯子。

現代對於兒童的教育，有所謂性向的測驗，以決定其「可塑性」。例如有的小孩喜歡在牆上亂畫，有的小孩歡喜玩機械，看見手錶的指針會走動，覺得稀奇，就拿小螺絲刀去拆開來玩。有些講究性向問題的家長、老師們，就讓他去拆，認為這孩子將來可能成為一個發明家。

可是，假如我是這孩子的家長，則不一定讓他去拆，最多是破舊不堪的廢棄物，才讓他去拆。因為小孩子天生有一種破壞性，人性中是具有反動成分的；尤其小孩好動，看見稀奇的東西，非打爛來看看不可。不過也有人生來想當領袖的，也有人生來想當和尚或神父的，這就是性向問題。所以教育孩子，要從其可塑性方面去培養。有時候父母看到子女是不可造就的，就要趕快給予他職業教育，使他將來在社會上站得住腳，能夠有飯吃；對於造就

不了的，如果一定要他有很高深的學問，出人頭地，這是不可能的。一個人的成功，各有各的道理，不一定要書讀得多，這就如中國的諺語：「行行出狀元」，也就是現代的理論，要注意性向問題，與告子所說的差不多了。

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是講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這是引用《論語》上所記載孔子的話，至於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並非孔子所說，是宋儒加上去的，後來打倒孔家店時，都歸到孔子頭上去了，孔子很是冤枉。在孔子以後，戰國時代的孟子，走的是孔子的路線，也是主張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的。

同樣，儒家另外有一個人荀子，也是學孔子的路線，但荀子主張人性本惡，「善」是後天的教育改造，和告子說的，把杞柳樹做成杯子的比喻差不多。例如一個嬰兒剛生下來，如果餓狠了，就會伸手猛抓母親的乳房，不管母親不母親，只是自己要吃，所以人性本來是如此的。假使是雙胞胎，一個吃飽，一個沒吃飽，餓的一個一定會去搶來吃。有一位同學生第二胎前，頭胎的女兒只一歲多，似乎知道將有另一個孩子出來，分享她的母愛，所以對

母親特別拍馬屁、討好，也就是在吃醋。所以荀子說，人性本來是惡的，要靠後天的教育改良去轉惡成善，這是教育的重要。教育的功能，是把惡的人性改變為善的，荀子的說法，好像是與孟子唱對台戲。

第三派是告子，主張人性不善亦不惡，像樹木一樣，將來成為什麼器皿，做什麼用途，都是人為後天的塑造而成的。

不過在春秋戰國時代，孔子之後，孟子之前，有另外一派理論，就是墨子。他對於人性的說法，後世稱之為「染絲論」，他主張人性原來是純白的，如蠶絲一樣，沒有任何顏色在上面，而要看環境、家庭、父母的教育、社會的背景、學校教育等等客觀條件決定。如白絲一樣的人性，沒有顏色，染灰色就成灰色，染紅色就成紅色，染綠色就成綠色。這還是承認先天本來的人性，並無所謂的善惡是非，問題是在後天的教育。

這四派的主張，一直爭論到現在，幾千年來，成為東方文化中對於人性哲學上的大問題。

現在回頭來看《孟子》書上的本文：

孟子說「以人性為仁義，猶以杞柳為桮棬」，不要看了杯子，就認為杞柳樹也是那樣方圓的形狀，因為杯子的方圓之形和中空，都是經過人工塑造的。這也就是說，人性和杞柳一樣，它未來的價值與用途，事先是無法預知的，他的善惡是非，也是無法事先確定的，這是告子的理論。

孟子當然反對他的說法，因此講：依你這樣說，你把杞柳樹砍下來做酒杯，是順著杞柳樹本身紋理性能來做嗎？還是改變了柳樹原來的紋理做成的呢？

要注意這兩句話，杞柳樹的紋理，是直線長的，一個杯子的中間，硬是用鑿刀把它挖空的，這是「戕賊」杞柳之性了；那麼人生下來的善良心理，是用人工刻木頭的方法，改變了他的本性而塑造出來的嗎？你這種思想太可怕、太厲害了，會害了天下的人，會率領天下的人，殘害人性的善良面。換言之，這等於近代西方唯物思想和各種主義的思潮，影響中國，影響世界，亂了一百多年。

現在過安定生活的青年，對於這種話，也許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；事實

上，這是人類社會文化思想的大問題，年紀大的人所關心的，正是這件事。因為歷史的演變，時代的推動，並不是經濟的發達、鈔票的力量、武器的威力，這些只是思想運用的工具而已，而遷動時代變易的根本，是人類的思想。看起來思想是抽象的、無形的，但思想的正與反，只要偏差一點，就影響到整個人類的禍福。

孔子當年作魯國的司寇時，一上台就殺掉少正卯，就是因為少正卯的思想問題影響力太嚴重了。西方文化在過去對於人性哲學方面的討論，太少也太淺了，可以說他們沒有歷史文化的深厚根基，沒有「內明」之學，所以才會產生各時各國各種紛紜的思想。

我們先了解了這一段，就可以討論了。當然我們的討論不能偏私，不能說孟子和告子誰對誰錯，我們是用一種客觀的態度，來作研究。

我們先研究孟子自己的話，在〈離婁〉下篇中，孟子曾經說：「天下之言性也，則故而已矣。故者，以利為本」。以現代語言說出來，就是世界上一般人談人性的問題，多半說人性的本然而已。他原文的「故」字，很難用

現代的任何言辭來表達，因為它代表了很多意思。時隔兩三千年，在當時的社會，這個「故」字作什麼用，表達什麼意思，與現代我們對這個「故」字的用法，並不一樣，甚至差別很大。

例如古代的「毒」字，同時有治療的意思，而現代治療是治療，毒是毒，沒有人以毒字來表達治療的意思了。而且文字與語言是密切關聯的，而語言又因區域不同而有異，所以研究文字，還要研究語言。例如「沒有」這一口語，閩南人的口語為「莫」，客家人則說成「毛」，溫州一帶則和英文的「No」很相近，講作「喏」；江西人則如北京人將「不用」說成「甬」一樣，把「沒有」兩個字，拼成一個音說出來，而且創了一個新字。這些不同的語言，都表達「沒有」這一意義，怎能說是誰對誰不對呢？所以語言文字的研究，是一件很煩瑣也很難的事。

這裡孟子說「故而已矣」，這個「故」字相當於「本然」一辭的意思，全句的意思是說，世界上的人談人性，只是談人性的本然而已矣。換言之，人性為什麼是這樣，本來是這樣而已。至於「本然」是什麼？後面發動那個

「本然」的又是什麼？沒有進一層的討論。孟子說：世界上的人討論人性，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，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觀點，利用現成的資料討論而已。但都是以有利於自己的說法為根本，其實就是想當然的討論這個（本然）的人性。例如搞宗教學說的人，對於有利於自己的觀點，就加以引用；對於不利的，那就不引用了。

現在我們「借用婆婆的帕子向婆婆拜年」，引用孟子自己的話，來看他與告子的辯論，那麼孟老先生批評人家的話，也是「故而已矣。故者，以利為本」了。告子講杞柳與茶杯，孟老夫子也講杞柳與茶杯，告子的話是對或是不對，暫且不說，而孟子這種說法，仍大有討論的餘地。

告子以人性比杞柳，仁義比茶杯，仁義等於說是人為的，就像把杞柳人為製成茶杯一樣。孟子批評告子的說法，問告子以杞柳製茶杯，是照杞柳木的紋理去做成的呢？還是不顧紋理，硬用人工去雕鑿而成的呢？如果是硬雕鑿而成的，那你告子的這種主張，是天下的禍害。孟子先用一頂大帽子，把告子的話壓下去，蓋住了。不過，如果講論辯的邏輯，孟子這個譬喻是不大

合適的。

至於告子的話，也是有問題的，因為人的天性，究竟是善的還是惡的，還是不善不惡，都是可以討論的。

水流的問題

告子曰：「性，猶湍水也；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，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水信無分於東西，無分於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；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；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為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」

告子又用另一個譬喻，他說人性就像是流得很急的水，就像瀑布那樣，急湍而來，注入了潭中，東方有缺口，就往東方流；西方有缺口，就往西方

流；而自己並沒有意思向哪裡流，只是哪裡低窪，就向哪裡流。所以人性，無所謂善，無所謂惡，等於水一樣，並沒有向東流或向西流的本意。

孟子說：你說水不分東西，流東流西，不是水的本意，這話或者可信，但是難道不分上下嗎？

我們以佛家的因明學來說，孟子和告子兩家的辯論，在形而上最高哲學引用的邏輯，所應用的邏輯方法，是屬於因明學中的「比量」。這是很可惜的錯誤，因為在論辯學上，「譬喻」本身就是靠不住的。佛家亦常常用水來譬喻人性，但譬喻完了要趕快掃開這個譬喻，所以用譬喻來辯論，或打筆仗，有時是不合理的。這種辯論方法，也猶如諸葛亮說劉禪的話叫作「引喻失義」，就是引用的比喻並不完全恰當的意思，在譬喻上打筆墨官司或口舌官司，往往失去了哲學真正的意義。

就像這裡孟子的引喻，他說告子你說得對，水是不分東西，那麼水不分上下嗎？假如我是告子，我就告訴孟子說，水也不分上下，水是喜歡平的，水之分上下東西，都是勢流的關係，是客觀的因素，並不是水的本性，水只

是平的，所謂水平，是水向上、下、東、西、南、北亂流，那是水勢的軌道。

可見孟子是天天希望天下太平，拚命說人心本來是善的，但是，有一點他講錯了，有些急不擇言，別人打了一個譬喻，他也跟著人家的比喻去說。古人讀他的書，深信不疑；可是現代我們讀這些書，就會產生評論。就像兒童時期，背誦、默寫，並不懂它的意思；老師說「你大了就會懂」，後來長大慢慢懂了，可也就越看越有問題，越想討論了。

孟子說，人性天生就是善良的，等於水性，天生就是喜歡向下流的。

水性是不是喜歡向下流，這是很難肯定的。我們中國文學中有兩句詩說：「天上眾星皆拱北，人間無水不流東」，研究天文，在北半球看北斗星，是定在那裡不動的，其它的星都對著它轉，差不多一年就周而復始，轉動一周。第二句「人間無水不流東」，這是中國人說的，嚴格的說，中國境內的水也並不完全東流，在雲南一看，橫斷山南將地勢切斷了，山上的茶花延伸數十里如霞如錦，真美；但是怒江的水，湍急如箭，飛鳥難渡，人也根

本不要想去採到花了；而那裡的河川溪谿，就成為「人間無水不流南」了。在廣東也是一樣，因為五嶺之南，山勢向南傾斜下去，到了中東一帶，則是「人間無水不流西」了。這些都是地球上知識範圍的事，人文文化因時間、空間的擴展，知識也因之擴展而有所變遷。所以今日文化所肯定的觀念，說不定將來在另一太空、另一星球上，果真有生命的話，他們的文化也許根本上會影響整個地球的人類文化，這都是且看下回分解的未知數。

孟子又說，水急流下來，我們將他一擋，他就沖到頭頂上去了。如果用「馬達」機械的力量，也可以把他一激，送到山上去；可是這並不是水的本性，而是另外一股力量加上去的。一個好人有時會對別人使壞，不一定是他的本性，而是受刺激變化而導致的。所以，人一受刺激，什麼都可能幹得出來，但這不是人的本性。

告子和孟子的這種用比喻的辯論，好像雙方都對，也好像都不大妥當。對於孟子所講的話，我們也可以對他說：「孟老夫子呀！夫子之言性也，則故而已矣，故者，以利為本」，但是你不仍是因現象來講人性的嗎？你講的

還是形而下的，是以現實資料來講的。所以現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，不管孟老夫子在天上也好，在孔廟東廡也好，西廡也好，假如可能，很想請他來，向他請教一番。

到這裡，他總算批駁了兩次告子，但並無告子答辯的紀錄。看上去告子已經吃了兩次癩了，現在第三次又要挨打。

此白非彼白

告子曰：「生之謂性。」

孟子曰：「生之謂性也，猶白之謂白與？」

曰：「然。」

「白羽之白也，猶白雪之白；白雪之白，猶白玉之白與？」

曰：「然。」

「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；牛之性猶人之性與？」

告子說：「生之謂性」，他的這一說法，對人性有了一個界限，他認為人在生下來的那一剎那，就確定了他的個性。這個理論要注意，他指稱，

人性是脫離娘胎時產生的，和佛家所說「明心見性」的「性」，並不是一樣的。佛家所問的是在媽媽未生我以前，我是什麼？佛家的本性是在媽媽未生以前最初原始的那個本性，與告子這裡所說母親生下時所產生的本性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。

關於佛家所言之性與告子所言之性的不同之處，我們在這裡暫不研究，現在我們看告子第三次很可憐的挨批。

孟子說：「生之謂性也，猶白之謂白與」，孟子爭辯起來，有時候像外國人在參議院、眾議院裡爭論一般，也許是臉紅脖子粗的說：你講人生下來的所謂人性，是不是講這個白和那個白是一樣的？

告子說：是呀！告子一開頭就吃癩了，假如是我的話，一定會說：孟先生，你講清楚一點，什麼這個白，那個白的？這是白布之白，那是白璧之白。

孟子這樣的問話，也等於一個先天盲人，問人白是什麼樣子？答話的人很難描述，只好說像白布那樣白；盲人再問白布的白又是什麼樣子？人家只

好告訴他像白雪那樣白；盲人還是不能體會，又問白雪是怎麼個白法？告訴他是白粉一樣白，他還是不明白。於是有人就拿一隻白鵝來給他撫摸一下，告訴他就是如這白鵝一樣的白，走路時會呱呱叫的。這時盲人說，你早這樣告訴我，不就好了嗎！後來有人問什麼是白，這位盲人就曲起一隻手來作鵝頭狀，口裡唸著「呱呱」。

現在孟子這樣問告子，也等於問：白粉之白，與白鵝之白一樣嗎？

告子說：是呀！

孟子又說：那麼，白羽毛的白，與白雪的白是一樣嗎？白雪的白，又與白玉的白是一樣嗎？

告子又吃癩了，說：是呀！是一樣。

於是孟子說：狗的性與牛的性，牛的性與人的性，都一樣嗎？

告子被他一棍子打悶了。

看來告子這個人，學問還不錯的，可是在辯論的邏輯技巧上，卻是輸了孟老夫子一截。

我們仔細想想，孟子辯論人性的問題，辯到這裡，可以說已經遠離主題了，而問題在於，辯論中引用的譬喻是否恰當。如果在現代，我們作為這個辯論會的主席，一定拿起木槌，在桌子上一敲說，停止辯論。並且宣布說：告先生講的主題，是有生命之後的人性問題，說「生之謂性」，孟先生，請不要離開主題，說什麼白呀白的，又扯到狗性、牛性身上去兜圈子。

這種辯論邏輯，聽起來是滿鋒利的，可是把主題避開了。本來是談什麼是人性的問題，孟先生卻扯到狗性是不是等於牛性，牛性是不是等於人性的問題上去了。正如本來討論「品茶」的問題，可一路越辯越遠，去討論「品酒」，最後變成「品醋」去了。所以他們的討論，本來是研究問題，結果因為性急，又引喻失義，再加上「故而已矣，故者，以利為本」的態度，最後變成爭論了。

告子為了人性問題，已挨了孟子三次批。

人性的先天和後天

在我今天看來，對人性的幾個問題，中國後世學術界很多人，都以孟子這裡所談的這段話拿來辯論。也就是把孟子說的「天下之言性也，則故而已矣」，和告子說的「生之謂性」，來討論人性的問題。我們現在討論人性，須要了解形而上人性的「本體」問題，與形而下人性的作用與現象的問題，「未生之前誰是我，既生之後我是誰」？究竟有沒有一個「我」？假如有，這個「我」從哪裡來？到哪裡去？怎麼生的？怎麼死的？有形無形？唯物還是唯心？正如「先有雞，還是先有蛋」的問題一樣。假定是上帝創造了萬物，又是誰創造了上帝？假如說，上帝是上帝的媽媽造的，上帝的媽媽是上帝的外婆造的，那麼誰又生了上帝的外婆的外婆的外外婆？假如說是佛造

的，誰又造了佛？或者說，人生本來是如此的，那個「本來」又是什麼？這就是哲學，就是大科學，也是宗教的根源。就像說地球是圓的，又是誰使它圓的？哲學與科學都是要想追尋這種問題的答案。

世界上人類有記載的歷史，迄今約五千年，事實上當然不止五千年，因為地球的形成，據說就有好幾十億年了。地球上最早是先有人呢？還是先有螞蟻或蟑螂呢？不管先有什麼，那最早的第一個始祖，又是哪裡來的？這就是哲學，也是科學，也是宗教。

任何一種宗教，開始時都是為了追求這個問題的答案。不過後來，宗教自己無法解答就設定了一個界限，就是不准問，信就好了，告訴你這樣，就是這樣。哲學也是信，例如說，房子裡是亮的，但是總得打開一條門縫，讓我看到裡面一點點，我才會信，這是哲學家的態度。至於科學的態度，則是一定要進去看看，體會一下才信。所以宗教、哲學、科學，都是為了追求一個本性，一個宇宙萬有的本來，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。

但是孟子在這裡所謂的人性，不是講形而上人性的本體問題，而是人性

的作用與現象。孟子說的惻隱之心、羞惡之心、辭讓之心、是非之心，都是人皆有之，但這些也都是生下來以後的。中國的道家分先天與後天，先天就是形而上的，後天就是形而下的。先天也就是父母未生以前，那個本性為先天；父母懷胎以後，在胎中已經是後天了。問那些懷過孕的母親們就知道，有的胎兒在胎中很安靜，有的胎兒就會拳打腳踢的，所以人在娘胎就已經是後天了。而本書記載告子說「生之謂性」，就是指離開娘胎以後，這樣說來，告子說的這個人性是屬於後天的後天了。

所以後世的學術界，是以後天人性的理論，去推測形而上的人性本體。就像孟子說的，這個白就是那個白，那個白就是這個白，也就是天生的盲人彎了手臂成鵝頭狀，再學兩聲鵝叫，就認為是白，而形象與白是不相干的。

由此我們了解，本節討論人性的問題，是以「生之謂性」的這一個階段的「人性」來討論的，換言之，是討論後天的人性。但孔子的思想並不是這樣，在尚存的資料中，孔子很少談到人性問題。根據《論語》及有關資料，我們發現，孔子在這一方面的學術思想非常高深，子貢說他罕言天道事，就

是孔子很少說形而上這方面的事。換言之，就是孔子認為這班學生，還不夠程度來聽這個問題。所以當子路問他，人死以後是不是還存在？又往哪裡去？孔子就批評他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。意思是說，不必問死後到哪裡去，先要研究生從哪裡來，先要了解生的問題；現在活著的許多問題，都不能了解，如何能了解死後與生前的問題。

孟子所以在那個時候來討論這個問題，是有其時代的原因的。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，已經由春秋到戰國戰亂了三百多年。說到戰亂，近三十年來，在台灣安定中出生成長的人，聽到戰亂一辭，不會有所感受；而五十歲以上的人，對於戰亂的苦難艱危，感受太深了。在戰亂之中，人的生命毫無保障，一次戰爭下來，人就大量死亡。像秦國的白起，打一個勝仗，被他活埋的俘虜就是四十萬；這些人都是母親十月懷胎，三年哺乳，費了多少心血勞苦撫育長大的。像這樣三、五年一次戰爭，幾百年下來，打得民不聊生，而且民窮財盡。

一個社會的動亂越多，人的思想漸漸就對生命起了懷疑，人為什麼有

這許多苦難？人生是為了什麼？人又是怎麼來的？人為什麼如此爭鬥？為了這些問題去尋求答案。所以哲學思想的發達，都是在社會極動亂的時候。在極苦難的時代，會產生大學問家、大哲學家；太平時代則產生藝術家、文學家，創作一些藝術品，供人欣賞。所謂「不做無益之事，何以遣此有涯之生」這句話，正是太平人語。

所以在變亂的時代，就研究人性的問題了，因此，孟子、告子他們的時代，遠比孔子時代更為嚴重的來辯論這個問題，這也是歷史文化的時代趨勢。由古代就可以了解現代，在苦難的時代，才提出人道、人權、民權這些問題來爭論，如果在太平時代，自然不需要去討論這些問題。

現代青年該注意的問題，孟子在後面就會說到：「富歲子弟多賴」，台灣這三十年來，在社會富有安定、繁榮之中，青年們太舒服了，賴皮的也太多了，慢慢到了嬉皮青年的階段了。